

移动性视角下郭沫若空间轨迹 与思想演化的互动研究

汪馨宁¹ 黄欢² 武心怡¹

1. 西交利物浦大学和谐管理研究中心, 苏州;

2. 汕头大学文学院, 汕头

摘要 | 本文以移动性理论为基础, 基于空间轨迹方面探讨了郭沫若在四川青少年时期、上海革命时期与日本流亡时期三个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演化历程。研究引入Tim Cresswell提出的三元辩证移动性框架, 分析郭沫若的地理流动如何影响其文学创作、思想转型与身份建构。文章旨在突破以“思想内容分析”为主的传统路径, 尝试从“空间—思想”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郭沫若的成长轨迹, 为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路径。

关键词 | 郭沫若; 移动性理论; 空间轨迹; 思想演化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x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中国现代历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深刻变革, 在这一进程中, 众多文化名人不断探索与实践, 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脉络。郭沫若先生(1892—1978)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及政治人物, 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生动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和社会变迁, 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宝贵的材料。尽管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有大量关于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和生平经历的研究, 但鲜有学者关注其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之间的互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其实全面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深刻认识。

近年来, 移动性理论的兴起为探讨个体在时空流动中的经验提供了全新视角。该理论不仅关注物理上的移动, 更深入探讨象征性、社会性与交互性流动在个体身份构建、思想形成与文化表达中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 研究郭沫若的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一方面, 关注空间轨迹有助于揭示郭沫若如何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积累经验、接触多元文化, 从而为理解其文学创作及思想变革提供关键线索; 另一方面, 分析思想演化则有助于把握他如何在社会历史变革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认同与理论视角, 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其作为文化巨人在时代转型中的成长路径。本研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项目“移动性视角下郭沫若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的互动研究(GY2024C11)”成果。

通讯作者: 武心怡, 西交利物浦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

文章引用: 汪馨宁, 黄欢, 武心怡. 移动性视角下郭沫若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的互动研究[J]. 社会科学进展, 2025, 7(3): 259–264.

<https://doi.org/10.35534/pss.0703045>

究将通过郭沫若在不同时期的地理移动、文学创作以及身份认知等多重维度的考察,构建其移动经验与思想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

1 郭沫若研究现状

纵观近年来学术界对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出其研究主题呈现出多样化和系统化的特点。概括而言,当前学界主要围绕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思想观念、史学成就和生平经历四个方面开展了深入且广泛的探讨。

一是对郭沫若文学创作与译作的研究。郭沫若作为文学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小说和翻译作品等领域。学者们不仅关注其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风格及审美取向,也深入分析了其作品所体现的文化意涵与时代意义。例如,有学者从翻译理论的视角对郭沫若的翻译理念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他在翻译实践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理论观点,突出了其“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翻译特色^[1]。另有研究则从文学叙事的角度出发,指出郭沫若小说文本中的“日本形象”深刻反映出时代背景下边缘文化面对中心文化时的微妙关系与文化心理状态^[2]。

二是对郭沫若思想观念与文化视野领域的研究。郭沫若作为思想家,在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交流及社会变迁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见解,相关研究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对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郭沫若在面对民族认同与文化身份危机时,通过阶级认同、怀古主义及东洋西洋联盟等多元话语策略来实现文化突围^[3]。现有研究也证实了郭沫若思想观念的转折与社会交往、文化交流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其思想的变迁并非孤立发生,而是深受社会网络和思想交流的推动与影响^[4]。

三是对郭沫若史学成就的研究。郭沫若在甲骨文与金文考释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引发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已有研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成果,梳理了其对甲骨文、金文考释的具体贡献,并指出其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古文字学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5][6][7]}。整体来看,史学界已普遍认可郭沫若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对史学性质、任务与史学指导思想、史学学科、规划发展的重要学术价值^[8]。

四是对郭沫若生平经历及社会交往的研究。学者们通过挖掘与分析郭沫若的档案资料、书信日记以及课堂笔记等史料,尝试还原其个体生活与社会网络对其思想创作产生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以郭沫若早期的《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为基础,展示了郭沫若早年个性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9]。还有学者从人际传播视角出发,考察其书信交流文本,揭示郭沫若在不同时期的人

际交往模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10]。此外,也有研究以郭沫若中学时期课堂笔记为切入点,探索其早期教育经历对后来思想观念形成的深刻影响^[11]。

尽管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相对丰富且深入,但目前仍缺乏将郭沫若的空间移动轨迹与其思想演化进行有机结合的研究。已有研究大多侧重静态的个体经历、文学成就或学术贡献分析,忽略了个体空间移动如何动态影响其思想观念的生成与变化。因此,本研究引入“移动性”这一理论视角,深入探讨郭沫若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对郭沫若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2 移动性理论

移动性理论(Mobility Theory)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一种重要理论视角,主要用于探讨人、物、信息等主体在空间中的移动如何影响并塑造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结构。这一理论强调,移动性不仅局限于物理空间上的位置转移,还涉及更为广泛的象征性、社会性和通讯性流动,体现为个体之间、区域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多维交互关系,这对理解现代社会关系、文化交流以及个人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12]。

2006年,约翰·厄里(John Urry)与咪咪·谢勒(Mimi Sheller)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期刊发表的论文*New Mobilities Paradigm*中正式提出移动性理论,明确了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潜在价值^[13]。在这一基础上,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进一步系统化地提出了移动性的三元辩证框架,对移动性概念做了全面的理论建构。具体而言,克雷斯韦尔的模型包括以下三个核心维度:(1)移动性作为经验事实,指个体或物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流动,其特征可以通过科学手段进行观察、测量与分析;(2)移动性的表征,强调通过文学、电影、摄影等文化媒介或象征符号对流动进行赋义,使移动性获得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意义;(3)作为具身体验的移动性,即个体在移动过程中体验到的感官感受、情感情绪以及身体实践,直接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与思想观念形成^[14]。

自克雷斯韦尔提出移动性三元辩证框架以来,该理论逐渐发展为社会学、地理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重要的理论分析范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和深化。在地理学领域,已有研究指出移动性理论为理解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一方面,移动性理论被用来解释个体、物质或信息在空间移动中如何产生特定的地理形态,并揭示出这些地理形态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意义^[15];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则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并总结了国内外移动地理研究的成果,形成了从移动主体、研究主题到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等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进一步推动了移动性理论在地理

学研究中的深入应用^[15]。

同时,移动性理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也展现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获得了学术界的积极关注与应用。一些文学研究通过移动性理论,强调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中不仅要关注具体的物理移动,还要探索移动背后的文化隐喻与象征意义,尤其关注被遮蔽或压制的流动性现象,以及这种流动性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16]。有的研究则以文学作品中现代交通工具的意象分析为切入点,揭示出流动性所体现的现代性悖论,探讨交通工具在文学文本中所象征的自由进步与束缚压迫的双重内涵,从而深化了对现代性的反思^[17]。此外,也有学者运用移动性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中族裔身份认同和移动经验的关系,凸显出族裔群体在空间流动中形成的特殊经验与认同模式,丰富了移动性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中的应用维度^[18]。

综上所述,移动性理论以其跨学科、多维度的分析视野,展现出丰富的理论潜力与广泛的应用价值。本研究将借助蒂姆·克雷斯韦尔的三元辩证框架,从郭沫若个人空间移动的经验事实、其文学创作中的移动性表征,以及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具身移动体验三个层次出发,探讨郭沫若在四川青少年时期、上海革命时期以及日本流亡时期的空间轨迹与思想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3 空间轨迹与移动性对郭沫若思想演化的影响

本部分基于蒂姆·克雷斯韦尔提出的移动性三元辩证框架,探讨了郭沫若在四川青少年时期、上海革命时期、日本流亡时期三个不同人生阶段的空间轨迹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文学创作和身份认同,揭示空间流动与思想演化之间的深层次互动关系。

3.1 四川青少年时期

郭沫若童年时期虽然未进行大范围的地理迁移,但在家乡乐山沙湾,他每日从家宅往返于家塾之间,并因厌烦塾师严厉管教而逃学,体现出其在有限空间内的微观流动与反抗意识。随着清末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他的大哥从成都寄回《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等新式刊物^[19],尽管他本人尚未离开家乡,但通过阅读这些承载新思想的刊物,他得以间接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并由此萌发了对现代民主理念的初步认识。

1905年,他从沙湾乘船前往乐山县城参加高等小学堂考试,完成了第一次具有明确意义的空间移动。这次实际的地理迁移使他突破乡村的封闭,首次直面外部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与教育体制冲击。1910年至1912年间,他的空间轨迹再次显著扩大,先后就读于嘉定府官立中学堂就读,并在前往成都时,途经眉山、彭山、双流等地,通过轿子、鸡公车等交通工具跨越城乡,实际感受到城乡之间在文化、经济、社会风貌上的巨大差异。这

些频繁的身体移动使他直接体验到清末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与变革。

从移动性的表征分析来看,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清晰地表现出对空间移动经验与思想情感的表达。他高等小学堂时期所作的《卹居即景》,以细腻的语言描绘乡野生活图景,表现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题王制讲义》等诗文则流露出对新知识与启蒙思想的强烈渴望,体现出思想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21]。进入嘉定府官立中学堂后,他在《秋绪》等文学创作中表达出对封闭空间的急切挣扎与焦虑,“人生一世无自立,令人叹息长掩泣”正是这种内心焦躁的鲜明写照。他在自传中也坦言:“嘉定那样的井底,我是不想一刻羁留的”,文学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他在地理空间移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思想与心理波动。1910年到成都后,他创作的《商业场竹枝词》生动描绘了都市现代化景象:“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反映出他在城乡之间流动时敏锐感受到的现代化进程;而返乡途中写作的《晨发嘉州返乡舟中赋此》则细腻表达了对家乡的怀念与城乡空间差异感带来的情感张力^[21]。上述作品体现出郭沫若空间流动中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郭沫若早期的空间移动经验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人格特质。他在家乡私塾时期因严厉管教而逃学的具身体验,培养了他对权威的反抗意识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在高等小学堂期间,因制度压迫所产生的愤怒与抗争,使他逐渐形成反抗权威、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想倾向。中学堂时期,面对保守陈旧的课程设置,他焦躁不安并急于突破空间的限制,与师生及驻军的冲突体验,更强化了他对社会权威的批判态度。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他主动投身四川保路运动,剪掉辫子这一身体行动体现了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积极参与的具身体验,他深刻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明确了对传统教育与封建体制的批判,提出“求学是为作官”的传统教育逻辑应被彻底否定。这些亲身实践与身体行动使郭沫若在空间移动中更深刻地感受到时代变革的紧迫性,为其日后赴日留学、接受彻底的现代思想与革命观念奠定了思想与实践的基础。

3.2 上海革命时期

从移动性作为经验事实来看,郭沫若在上海的经历体现了显著的空间移动特征。1921年,他自日本回到上海,直接参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革新中。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中心,街头熙攘的人群、电车和黄包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使郭沫若迅速融入激进的文化环境中。这种从海外到国内中心城市的物理流动,不仅拓展了他的活动空间,也促使他直接参与了创造社的建立,并出版标志性诗集《女神》。1924年,他再次离开上海赴日本完成学业,而

1927年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又辗转返回上海。此后的被迫迁徙、逃亡与流动，进一步加深了郭沫若对时代动荡与革命现实的深刻体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再次从日本返回上海，途中历经船只、火车等交通方式的频繁变换，显示出这一时期明显的跨国与跨区域流动特征。

在流动性的表征层面，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鲜明体现了思想情感在空间迁移中的表达。他的诗集《女神》融合象征主义与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想，作品中以女性、爱情等意象表现了对个性解放与反封建的呼喊，这种文学表达不仅具有鲜明的艺术性，也折射出五四运动之后社会变革的渴望与期待^[22]。1924年后完成的小说《漂流三部曲》，通过主人公爱牟的内心挣扎，生动展现了留学生群体在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困惑与冲突，这种文学上的情感流动清晰地表达了郭沫若在海外环境下对祖国现实的深刻关注^[22]。1927年回国后创作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则直接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径，反映出他在上海经历白色恐怖后的强烈批判意识^[23]。1937年抗战初期撰写的《北伐途次》等作品，又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与民族解放的决心。由此可见，他的文学创作与不断变化的空间轨迹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文学作为流动性表征的重要作用^[24]。

从具身体验的移动性视角来看，郭沫若的空间流动始终与他的思想演变密切相关。1921年在上海创办创造社时，城市现代化气息带来的直接感官体验，促使他迅速接受左翼思想并积极投入文学革命实践，身体移动与思想解放同步进行。1924年至1927年间，从上海返回日本，再回上海参与革命，这些身体上的跨国迁移过程，使他不断感受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时代责任的压力。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在逃亡与辗转中体验到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进一步促使他从个性解放逐步转向民族解放的思想关怀。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从日本辗转返回上海途中，经历战争的动荡与生死考验，深切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切身的身体实践，使他在文学创作中倾注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体现了空间流动对于思想与情感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3.3 日本流亡时期

1928年夏秋之际，因遭国民党政府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定居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江户川畔。这次跨国流动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空间，更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流亡初期，面对陌生的异国环境，他体验到强烈的文化冲击与身份边缘化，内心充满了不安与孤独。他在自传中写道：“满街的日本人看来都像

了他对民族与社会的深刻反思。

与此同时，日本先进的学术资源与便捷的交通网络，为郭沫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转型契机。每日往返市川与东京之间的电车，成为他连接居所与东京东洋文库、帝国图书馆等知识空间的纽带。他在东洋文库大量查阅甲骨文、金文资料，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著作首次以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系统解读中国古代历史，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著作”^[25]。地理移动带来的学术机遇，使他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结合，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寻找方向。

郭沫若在日本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他将跨国流动经验转化为文化与思想表征的重要途径。他的自传和小说不仅记录了流亡异乡的个人苦难，更透过文学语言与叙事结构，揭示出由移动性引发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的深刻变动。在《我的幼年》《反正前后》等自传作品中，郭沫若通过个人生命史与时代背景的交织，表达了个体空间移动与社会历史转型之间的隐喻联系。例如，《反正前后》创作于1928至1935年间，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作的时间重叠。他在其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得不面对两重的敌人，即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旧有封建势力。”这种宏观社会批判与个人流亡体验相结合的文学表征，生动体现了移动性如何在文学中产生丰富的象征意涵。

此外，郭沫若创作的小说《鸡之归去来》《浪花十日》等，以讽刺与反讽手法生动展现了流亡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与文化冲突。他在《鸡之归去来》中写道：“我一移动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刑士们的保护，日本刑士很客气，把监视两个字是用保护来代替”^[26]。这种文学表达凸显出个体在空间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身份焦虑，清晰体现了流动性在文学创作中的表征力量。

郭沫若十年间的日本流亡经历，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种透过身体体验不断塑造与重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从最初因监视而产生的焦虑与屈辱，到逐渐适应异国文化环境，并最终形成新的自我认同，这种具身体验贯穿于他的整个日本时期。一方面，流亡初期的监视体验深刻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黑猫》中他将这种焦虑具象化为“满电车刑士的眼光”，深刻表达了他在异国环境中感受到的边缘化与压迫感；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在市川江户川畔的自然环境中寻求精神慰藉，创作了《丁东草》等作品，流露出对大自然的强烈亲近与崇拜，例如他将江户川比喻为“希腊海神Poseidon”的力量（p.270）。这种复杂的心理体验既体现了郭沫若逐渐适应异国环境的过程，也促使他重新界定了自己作为跨文化视野中的思想者的身份定位。

4 结论

本文以移动性理论为框架，分析了郭沫若四川青少年时期、上海革命时期与日本流亡时期的空间轨迹与思

想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郭沫若在四川早期的乡土流动培养了他的叛逆意识与近代启蒙观念;上海阶段频繁的跨区域迁移,使其思想从个性解放逐渐转向民族解放;日本时期的跨国流亡,则促成了他从文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转型。三阶段的空间移动经验与具身体验,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身份认同,也证实了移动性理论对于探讨个体思想发展与文化变迁的有效性 with 适用性。

参考文献

- [1] 孔令翠,王慧.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1):127-131,141.
- [2] 吴妍妍.郭沫若小说中的日本形象[J].郭沫若学刊,2005(3):74-78.
- [3] 李永东.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含混与危机——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创作[J].文学评论,2012(3):147-154.
- [4] 李怡.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J].学术月刊,2015,47(2):113-119.
- [5] 罗业恺.郭沫若海外十年金文文献整理研究述要[J].郭沫若学刊,2017(3):65-70.
- [6] 罗业恺.试论郭沫若海外十年甲骨文献整理研究的特点[J].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8,21(1):85-88.
- [7] 陈仕益.再论郭沫若对甲骨文字形的误释[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19-23.
- [8] 卜宪群.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J].中国史研究,2022(3):16-21.
- [9] 邓经武.《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研究札记[J].中华文化论坛,2013(5):175-179.
- [10] 刘思文.基于人际传播理论的郭沫若书信传播特点和模型分析[J].郭沫若学刊,2016(1):52-54.
- [11] 康莉蓉,李怡.郭沫若中学笔记及其乐山——成都中学经历考释[J].新文学史料,2023(2):70-79.
- [12]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 [13]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2): 207-226.
- [14] Cresswell T.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06.
- [15] 许伟麟,柴彦威.移动性地理学视角下时空行为研究创新[J].地理学报,2023,78(4):1015-1027.
- [16] 朱璇.移动地理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基于文献分析[J].人文地理,2021,36(6):9-18,156.
- [17] Greenblatt S, Županov I, Meyer-Kalkus R, et al. Cultural mobility: A manifesto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8] 武越.移动性理论视域下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22,43(2):166-173.
- [19] 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
- [20] 林甘泉,蔡震.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21] 郭平英,秦川.敝帚集与游学家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22] 郭沫若.郭沫若自传:第三卷,革命春秋[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
- [23] 韩诚,赵洁.郭沫若与《请看今日之蒋介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5):80-89.
- [2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25] 光明日报编辑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EB/OL]. [2024-03-25]. 光明日报, <https://www.gmw.cn/01gmrb/2001-03/20/CB/03%5E18726%5E0%5EGMB3-211.htm>.
- [26]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27] 蔡震.“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读郭沫若的传记写作[J].博览群书,2016(4):5.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Moruo's Spatial Trajectory and Ideological Evolution: From a Mobility Perspective

Wang Xinning¹ Huang Huan² Wu Xinyi¹

1. *HeXie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re,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uzhou;*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mobility theory, examines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Guo Moruo across three distinct life stages: youth in Sichuan, revolutionary period in Shanghai, and exile in Japa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spatial trajectories. Drawing on Tim Cresswell's threefold dialectical framework of mobility, the study analyzes how Guo Moruo's geographic movements influenced his literary productio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The paper seeks to move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centered on "ideological content analysis," and instead reinterprets Guo Moruo'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spatial-ideological interaction. In doing so, it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or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cal shift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Guo Moruo; Mobility theory; Spatial trajectory; Ideological evolution